古文與經世：十九世紀初葉中國兩派經世思想的分殊基礎*

林　滿　紅

一、經世思想的分殊

十九世紀初葉的經世思想，常被視爲一個同質體來加以研究。在當時經世學者對於 1814 至 1850 年間白銀短缺這項貨幣危機的討論與建議之中，却呈現出有關人性、個人與社會、以及歷史進程等方面較屬於道德派與較屬於務實派的兩派不同看法。[1]

道德派根本上認爲整個危機源起於人性的自私。務實派則接受人性私欲的存在，而不去批評人性自私的是非。兩派重要人物如表一所示：

表一　兩個經世學派的重要人物

道德派	王　鎏、梁章鉅、沈　垚、孫鼎臣、徐　鼒、管　同、謝階樹、成　毅 楊彙濟、吳嘉賓
務實派	許　楣、許　槤、包世臣、龔自珍、魏　源、英　和、丁履恆、賀長齡 林則徐、李兆洛

就道德派而言，白銀短缺來自人們的囤積。人們所以囤藏白銀是因爲自私，因爲白銀單價較高，可以使人們在最不費力的情況下囤藏最多私產。另外，人們爲求物質方面的享受也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增加了白銀的消耗。政府既是由一羣受過完整道德訓練的官員所組成。這派學者認爲，解決相關問題的工作應由政府來完成。舉凡商貿、消費、移民等活動都要受到政府的控制。爲了解決因貨幣短缺、經濟蕭

* 此文曾蒙陸寶千教授提供改進意見，謹此誌謝。

1 經世思想的分殊一段及以下討論經世學者的學術淵源及其核心思想部分之處均摘自 Man-houng Lin, "The Empty Bottle Versus The Spilling Jar: Social Theories of Two Statecraft School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o be published by *Late Imperial China*. 又，此文所說之兩派只就貨幣危機之經世思想而言，並非經世思想只可有此兩派分法。

臺灣人文與思想研究資料庫

條所帶來的失業問題，政府需增加灌溉、防洪、治安等等方面的投資。爲使政府可以從事這些公共建設，取消當時不由政府發行的銀兩與錢莊私票，而由政府多發行不兌現紙幣與面值超過實質的大錢以增加政府的收入則爲理想方案。

務實派痛斥這種搜刮民財的方案爲「無國家體統之有」。他們認爲即使君主可以隨心所欲發行貨幣，該項貨幣可以買取多少人民的物品則由人民來決定。再者，如果君主可以透過發行貨幣增加收入，百姓也可跟著發行貨幣增加收入。到最後，還有誰肯接受如此大量濫造的貨幣？

與道德派取消現行銀兩或錢莊私票等激烈建議相對應地，務實派或是主張持續現有幣制，或是提出一些漸進的貨幣改革主張。其改革精神在於不以貨幣爲財政搜刮手段，但貨幣必是一種促進商業的手段。他們主張用銅錢取代銀兩做爲會計單位，銅錢與銀兩可依市價折換。由於普通百姓的收入爲銅錢，改以銅錢計算的稅收則無需再折銀兩，而受銀貴之苦。至於銅錢較爲笨重，則發行用銅錢做準備的紙幣以輸送遠方或進行大宗交易。務實派也主張用金、銀、白銅等貴重金屬鑄造硬幣。由於該等金屬本身都有價值，世俗如果政權鑄造這類硬幣，並且使硬幣面值與成本相近，那麼貨幣也就不致於成爲財政搜刮的手段。這些貴重金屬單價較高，也較便利於商貿發展。

對商貿、私人企業採取正面看法也是務實派與道德派的一大不同。在道德派看來，財富是有限的。商人不過是將財富由一方轉手到另一方。商人在這轉手過程中所賺取的利潤應由政府徵課來振興農業、育養人口。務實派認爲，透過商人們的有無相通，可以締造新的財富。市場的運作也往往可以產生政府無法造就的好處。例如當市面上劣幣充斥政府難以申禁時，商人們竟印起分辨劣幣、良幣的書籍，再加上百姓自己逐漸累積的經驗，劣幣終於受到淘汰。又如元朝曾有官辦的漕糧海運。爲了監督下屬沒有濫用職權，下屬的創新往往遭到壓抑。反之，清初開放民間的沿岸貿易，由於商號之間的自由競爭，造船、航海技術或是商家的誠信方面都有所增進。

另一方面，務實派認爲政府的干預不只會造成政治騷擾，也往往無法達到預期效果。以禁止民間製造銅器而改由官辦爲例。在强制沒收民間銅器構成騷擾的同時，官辦的銅器店對於零星銅器的修理工作必然多所抱怨，銅器價格也可能訂得較高，最後必然會再有民營銅器店崛起以應付民間的需要。就務實派的人看來，就如同貴重金屬本身的價值會限制君權的隨意擴張一樣，民間實際的經濟需要也會對政治力構成一種抗衡。

由於商人的經營可以帶來很多政府經營無法達到的好處，務實派認爲諸如開礦、漕運等等最好由商人來經營。他們也認爲政府對商人的稅課要輕，因爲每人有權享受自己的努力成果。雖然因爲每個人努力程度的不同會造成貧富的懸殊，但這也是「天」都無可奈何的事情，更不是「帝王」所能干預。

務實派認爲，除非個人過分追求自己的私利影響到公利，否則政府無需干預。以鴉片吸食爲例，如果只是個人吸食不影響到別人，並無需嚴厲處罰。但當有嚴重的社會影響時，則需嚴加刑罰。

在務實派看來，官員與其他人一樣都是人，前者並不必然比後者更有道德。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就在於人特別會顧及身家。客觀承認這項事實，而將社會問題溯源於外在的以及制度的因素，也是務實派與道德派的一大不同。

兩派思想是否在表達不同團體的現實利益，或是因爲兩派學者有很不同的根本信念？根據傳記、文集以及官方檔案探究以上思想差異的形成背景，並省視思想流派形成的一般規律，是本文的主要目的。[2]

二、現實利益難以說明兩派經世思想的分殊

㈠某政府部門的利益

政府中不同的部門有時會提出不同的經濟主張。這些在鴉片戰爭前後討論貨幣危機的學者所居職位如表二所示。其中王鎏僅爲一介秀才，並無當官資格，而充當幕友維生。包世臣、魏源等雖有舉人、進士等科名而有任官資格，但仍以充當幕友爲主要工作。

不能正式擔任高級官職的學者，雖然不能直接向政府表達他對時事的看法，但可以爲高級官吏草擬奏摺，或私下寫出自己的看法。[3] 基層官吏，如果任職中央，也可以看到奏章中有關時事的討論。[4] 即使不能透過政府機關中流通的奏摺了解時

2 本文所用嘉道年間學者的傳記主要取自：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史館檔之傳稿、傳包，周駿富編清代傳記叢刊所輯各清代文集中之有關傳記。本文所用之文集主要收藏於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臺灣大學文學院圖書館、臺灣師範大學總圖書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皇朝經世文編及其各續編。

3 齊思和、林樹惠、紀壽瑜編《鴉片戰爭》第一册，頁 501 指出吳嘉賓〈錢鈔議〉係爲軍機處章京汪本銓所撰。繆梓，《繆武烈公遺集》，卷一，22a 指出繆梓討論貨幣方面的幾篇文章是爲江西巡撫吳文鎔而寫。

4 如 S. M. Jones and P. A. Kuhn,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p. 150 提到魏源曾於擔任內閣基層人員期間廣泛閱讀檔案，並據此擬出很多改革建議。湯鵬《浮邱子》1a 姚瑩爲湯鵬所撰的傳記也提到：「君在軍機〔時湯鵬任軍機章京〕，得天下奏章，又歷戶曹，習吏事，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每致書大吏，多所議論。」

表二 經世學者的職銜

務實派	職銜	道德派	職銜
林則徐	翰林院編修，督撫，進士	吳嘉賓	翰林院編修，進士
賀長齡	學政，道台，督撫，進士	成毅	塾師
許槤	知府，糧道，進士	管同	舉人
許楣	戶部主事，進士	謝階樹	翰林院侍講學士，進士
龔自珍	禮部主事，內閣中書	王鎏	生員
魏源	幕友，縣丞，知府，進士	徐鼒	翰林院編修，進士
馮桂芬	翰林院編修，幕友，書院教師，進士	孫鼎臣	翰林院編修，進士
包世臣	舉人，幕友，縣丞		

事，也可以經由公開的京報得知天下大事。[5] 學者可以寫信給地方官吏表達他們對京報所報導時事的看法。[6] 十九世紀初葉經世學者討論時事的文章，經常彙成文集出版。李兆洛曾記：「稍可上口，已足標異，于是家家有集，人人著書。」可見當時印刷的方便。[7]

就表二所列有官職的學者而言，是否可以看出某一官職的人傾向於提出某種經世思想呢？

首先要指出，清朝官制當中，有關經濟事務，並沒有局限某種官員才能提出意見。[8] 有資格上奏章的官吏，包括各省督撫、布政使、刑部、吏部、戶部官員都曾對貨幣危機表達過意見。

再者，無論這些討論貨幣危機的學者所屬官職爲何，並沒有看到他們的意見與官職間有特殊關連。如表二所示，這些學者頗多任職爲翰林院編修——一個等待出任較高官職的職位，其中吳嘉賓、謝階樹、徐鼒提出的是道德派理論，而林則徐、馮桂芬提出的是務實派理論。

在有關貨幣危機的討論當中，也曾發生中央官吏與地方官吏意見紛歧的情況。[9]

5 根據 Ying-wan Cheng, *Post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and Its Modernization, 1860-1896*，頁 48 指出京報（或稱邸鈔）係爲各省駐在兵部的驛督所編。其中載有宮門鈔所錄朝廷活動如任用、覲見、上諭、硃批、奏摺等等。邸報經由驛站傳送省衙門，在官方默許之下，民間複製或改編邸報，銷路很大而獲利豐厚。

6 包世臣，《安吳四種》卷 1，1a-1b 提及當 1803 年運河泛濫時，包世臣由邸鈔上得知官員們頗爲擔心漕運受阻，即寫信給江蘇巡撫建議海運漕糧，並得到支持，只因浙江巡撫反對而告中挫。

7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册之二〔以下所引郭書均引自此册〕，頁 399。

8 Frank H. 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845-1895*, pp. 129-134.

9 張履，《積石文稿》，卷 17，2a 指出：王鎏的建議，「中朝言事之臣，頗采用君書以進，而外省大吏，或執以爲不可。故君說之行不行，迄今卒未有定也。」

例如包世臣的意見雖曾受到頗多中央官吏的支持，地方官吏則表示反對。[10] 包世臣更進而指出這是既得利益者的阻撓。因爲地方上的官吏，奏章多爲幕僚所擬，幕僚收入係以銀計，任何減少銀的貨幣功能的建議自然爲之所拒。但提倡削減銀貨幣職能的包世臣本人就是一個幕僚。而中央政府官吏支持、地方官吏反對的貨幣建議，除了務實派包世臣的建議之外，也還包括道德派王鎏的建議。御史當中，劉良駒、朱嶟等的建言較反映包世臣的思想，王茂蔭的建言則綜合了包世臣、王鎏的思想。所以兩派經世思想的分殊很難由經世學者所屬政府部門的差異來加以解釋。

㈡年齡差異

年齡差異是否構成代溝而可以用來解釋兩派思想的不同呢？於 1780 年代出身的學者當中，管同 (1780～1843)、王鎏(1786～1843)係屬道德派；林則徐 (1785～1850)、賀長齡 (1785～1848)、許槤 (1787～1862) 係屬務實派。務實派龔自珍 (1792～1841)、魏源(1794～1856)、許楣 (1797～1870) 以及道德派的沈垚(1798～1840) 都生於 1790 年代。道德派的吳嘉賓 (1803～1864)、務實派的馮桂芬(1809～1874) 都生於 1800 年代。徐鼒 (1810～1862)、孫鼎臣 (1819～1859) 均生於 1810 年代，也都是道德派。年齡的差異也不能解釋這些學者思想的差異。

㈢地區利益

近代中國經濟史家趙靖曾經指出，十九世紀初葉的經濟建議反映了東南沿海重稅地區地主、巨商與清政府之間的矛盾。他們將其不滿與抗議透過代表他們觀念與利益的失意漢籍高級官員表達出來。[11]

並非所有對貨幣危機表達過意見的官員都來自東南沿海省分。如贊成包世臣建議的穆彰阿和英和是爲旗人，意見與王鎏極爲類似的花沙納來自蒙古漢軍，意見與包世臣相近的朱嶟來自雲南。[12] 這些高級官員，以穆彰阿、英和而言，也非失意的漢籍高級官員。

然而，曾經對白銀危機表達過意見的學者官吏確實主要來自長江以南的省分。只是在每個省分中幾乎都可以找到道德派與務實派的並存。如湖南有孫鼎臣、湯鵬

10 包世臣，《安吳四種》，卷 26, 38b 指出對於他所提出的以錢代銀辦法，「頗傳鶴舫相國持此議甚堅，而外吏親近阻之者尤力。」

11 趙靖，易夢虹《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頁 24。

12 穆彰阿：Arthur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p. 582；英和：Hummel, p. 931；花沙那：傳包，第 3051～1 號。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賀長齡、魏源、陶澍、李星沅，[13] 安徽有王茂蔭對包世臣，[14] 浙江有楊象濟、沈垚對龔自珍、許楣、許槤，[15] 江蘇有王鎏、管同、徐鼒對馮桂芬、丁履恒，[16] 福建有梁章鉅對林則徐。[17]

研究清代考據學的 Benjamin Elman 認爲，江南地區由於過分重視考據，以致十九世紀初葉崛起的經世之學多由湖南學者或廣東學者倡導而非由江南學者倡導。[18] 但由討論過貨幣危機學者的籍貫分佈看來，江南地區無論在數量方面或是重要性方面，都居於領先的地位。只是，即使只在一個地區之內，意見仍然紛歧。以著有貨幣方面的專書並進行激烈爭辯的王鎏與許楣而論，兩者都來自江浙。事實上，當時學者官吏的文章常可郵寄遠方徵求反應。[19] 在雲南的林則徐與在陝西的李星沅，在江蘇的王鎏與在湖北的林則徐，在江蘇的許槤與在浙江的許楣，在江蘇的王鎏與或在北京或在安徽的包世臣，在江西的吳文鎔與北京戶部的官員都有過信件往返討論貨幣危機方面的問題。[20] 信件在區域之間可以互相傳遞，印刷在這個時期有所進步，官吏、幕友在全國之間常到處移動，都使得某地的經世學者可以得知其他地區學者的意見。[21] 地區並不足以構成一種區隔而影響不同經世思想的產生。

四種族利益

對貨幣危機提出不同解決之道的學者是否反映了種族利益？吾人以爲這些學者

13 賀長齡：李伯榮，《魏源師友記》，頁 24；陶澍，同上；李星沅：同上，頁 29；湯鵬：趙靖，《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資料》（以下簡稱《資料》），頁 49；魏源：同上，頁 85；孫鼎臣：同上，頁 205。

14 王茂蔭：趙靖，《資料》，頁 363，包世臣：同上，頁 3。

15 沈垚：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地理學家列傳十七，頁 471；龔自珍：趙靖，《資料》，頁 35；許楣、許槤：同上，頁 233。

16 王鎏：趙靖，《資料》，頁 208；管同：傳稿，第 5418 號，徐鼒：趙靖，《資料》，頁 174；馮桂芬：同上，頁 109；丁履恒：《續碑傳集》，卷 76, 20。

17 梁章鉅：見其《歸田瑣記》，序；林則徐：趙靖，《資料》，頁 73。

18 Benjamin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pp. 241-242.

19 Ying-wan Cheng, p. 37 一直到十九世紀，私人信函常經由朋友、熟人、特別的信差、轎夫、車夫、趕騾子的人寄送。大的城市，則有信局負責定期寄信。

20 林則徐與李星沅間有關貨幣問題的書信往返詳見林崇墉，《林則徐傳》，頁 13, 572～573。許楣與許槤之間的連絡，見許楣，《鈔幣論》序；王鎏與包世臣間之往返論辯見王鎏《錢幣芻言》中所收包世臣的信函及王鎏的答辯。吳文鎔與戶部官員間的往返，見於繆梓，《繆武烈公遺集》，卷 1, 22a。該資料指出吳文鎔在將繆梓爲之代擬的章奏呈上以前，先私下問戶部官員被採行的可能性。由於戶部官員的答覆是負面的，吳文鎔因而未呈上他的奏章。

21 有關信局的情形，參見：Ying-wan Cheng, Ch. 3。至於學者之遊走四方，可以方東樹爲例。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p. 238 指出他 1798 年由江西移至安徽，1819 年在廣東，1822～23 年在南京，而後再移至安徽，1832 年，他在蘇州，1840 年他又在到廣東。經過四十年的移徙，最後他回到故鄉桐城終老。

的確以漢人居多。然而，頗多證據顯示，即使是蘊含君權有限觀念的務實派學者如李兆洛、包世臣、林則徐等人，與滿洲皇帝之間關係頗爲密切。曾爲李兆洛、包世臣座主或幕主的朱珪（1731～1807）與英和都深得嘉慶皇帝信任。包世臣 1797 年曾於安徽擔任朱珪幕友，1801 年曾被朱珪邀到北京。[22] 1805 年禮部尚書戴衢亨、大學士朱珪與英和同任李兆洛的會試考官，極爲賞識李兆洛。[23] 朱珪是嘉慶皇帝任皇太子時的老師，朱珪的升遷曾爲和珅所壓抑，痛恨和珅的嘉慶皇帝因而更重用朱珪。[24] 許多因壓抑漢人意識而被禁止的晚明書籍即因朱珪的請求而被解禁。[25] 父親曾拒絕其與和珅之女結婚的英和，也極爲嘉慶皇帝所重用，而曾任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等職。[26] 包世臣曾於 1809 年向戴衢亨、1825 年向英和提出他的海運南漕建議。[27] 英和在開礦及海運南漕方面的主張與包世臣、林則徐、陶澍、賀長齡也都一致。1826 年英和甚而還因建議在北京附近開礦而引起嘉慶皇帝的不悅。[28] 然而，道光皇帝還是支持包世臣、林則徐等所提出的海運南漕及開礦主張。即使穆彰阿與林則徐在道光晚期曾多所衝突，但穆彰阿仍支持包世臣所提出的票鹽及以錢代銀方案。[29] 在務實派建議鑄造的貴金屬硬幣上面，滿文仍與漢文並用來標示貨幣價值。除了海運南漕問題牽涉到旗丁的既得利益之外，滿漢種族的對立也不能用來解釋此時期中經世思想的分歧。

(五)階級利益

最後，這些學者的不同主張是否代表了不同的階級利益？很多證據顯示，務實派學者官吏與地方商人之間的關係頗爲密切。林則徐在擔任江蘇巡撫期間曾請求政府貸款給江蘇銅商到日本購銅。他所提出讓商人出洋貿易、由商人開採銀礦、以及由政府鑄造銀幣的建議都說是轉述商人的意見。[30] 賀長齡在1825年接到廷寄要採行

22 大谷敏夫，〈包世臣の實學について〉，頁 63。

23 蔣彤，《李申耆年譜》序。

24 Hummel, pp. 185, 236.

25 大谷敏夫，《包世臣の實學について》，頁 1，65。

26 Hummel, p. 931.

27 大谷敏夫，《包世臣の實學について》，頁63～64。

28 Hummel, p. 932.

29 有關林則徐與穆彰阿之間的衝突，見林崇墉，《林則徐傳》，頁 267～268。

30 林則徐，《林文忠公政書》，乙集，17b～21b 指出商人呈請開放對西方貿易，同上，丙集，卷 9, 20～21指出商人呈請開礦民營；上諭檔，道光 13 年4月6日，清道光實錄，卷 235, 4 道光 13 年4月6日，《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一册，均載及商人向林則徐陳述鑄造銀幣的好處。

海運南漕時曾廣泛徵詢當地屬官、海邊住民，及航海者的意見。[31] 魏源爲賀長齡編的《皇朝經世文編》也收了不少江浙地區人士贊成海運南漕的文章。[32] 這些文章的作者除了士紳之外，也有商人。其中謝占壬是經常航行於福建、東北之間的海商。他在天津經商期間目睹漕運的情況，而指出清初開放商人沿海通商之後，航海技術及商人誠信方面的進步都足以接辦漕運的工作。[33]

雖然海運漕糧最後獲得商人的支持，但這一政策的採行並非來自商人的推動。魏源於 1826 年爲賀長齡所寫的文章指出，當漕米開始要由商人承運時，商人們頗爲觀望。一直到所運的漕米很快可以轉交官方，而託運的報酬也很豐厚，商人們才不再猶豫。[34] 1825年，包世臣爲初到任的江蘇巡撫提出十項海運南漕建議時，也沒有把握商人們是否支持，但到了1848年，包世臣指出這一顧慮已是多餘，因爲已經有很多商人要求承運漕米。[35] 包世臣另外提及，即使政府鼓勵商人開採銀礦，在一個資金短缺的時代，商人對這種風險極大的企業不一定有興趣。[36] 在一個銀越來越趨昂貴的時代，一般說來將銀囤藏起來較將銀支用了有利。此時期務實派很多鼓勵由商人著手的主張不能說是代表商人階級的利益。

若干經濟史家認爲，在白銀危機發生的過程當中，由於錢莊商人高抬銀價，錢莊商人與地主階級之間有明顯的衝突。[37] 在貨幣危機時期頗多學者官吏確曾激烈批評過高抬銀價的錢莊商人，認爲他們是擅奪國家利權。但在中國社會裏，大小錢莊分佈於不同等級的城鎮村莊。政府的稅銀常需透過錢商熔鑄，錢商也是很多產業的資金來源。即使政府有權撤除錢莊執照，或加重營業稅收，錢莊也可以隨時歇業而使百業停頓。[38] 錢商的高抬銀價，不只地主階級受到影響，任何需以銀納稅或借取銀兩融通資金的人都受到影響。因此，它所造成的問題是普遍的問題，而不是某一特定階級的個別問題。

丁韙良 (R.M. Martin) 在這個時期的親身觀察更指出頗多官吏甚而政府本身在當舖中都有投股。當舖也是一種傳統的金融機構。[39] 事實上，傳統中國錢莊乃至諸多商業組織的資金多半來自合股。一個看似人名的名稱常是這個共有財產組織

31 魏源，《古微堂內外集》，卷 7, 35a。

32 魏秀梅，《陶澍在江南》。頁 109~110。

33 《皇朝經世文編》，卷 48，亦見巫寶三，馮澤，吳朝林，《中國近代經濟思想與經濟政策資料選輯》。

34 魏源，《古微堂內外集》，卷 7, 34a。

35 包世臣，《安吳四種》，卷 3, 24b。

36 同上，卷 26, 38a。

37 葉世昌，《鴉片戰爭前後的貨幣學說》，頁 12。

38 Martin R.M. *China: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Social*, Vol. 2, p. 106.

39 Martin, Vol. 2, p. 1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總稱。用這樣一個名稱代表商號可以掩蓋股東與這個商號之間的關係。[40] 不同等級的地主可能投股於不同等級的錢莊。[41] 一如中國的城市與鄉村不能如在西方一樣的明顯劃分，中國的地主與錢商也不是對立的兩個階級。[42] 沈垚即曾指出，在他所屬的時代，很多學者官吏出身商人家庭。[43] 在王鎏的貨幣建議裡，雖然政府印製的紙幣透過錢莊發行時會給錢莊一些手續費，但錢莊原有的白銀都得盡繳國庫，這是對錢莊極爲不利的一種建議。而王鎏的祖父曾於徽州經商。徽州是中國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44] 曾激烈批評錢商擅奪國家利權的包世臣，雖然父親來自破落的地主家庭，母親則出自商人世家。[45] 這些證據都顯示出階級利益難以說明此時期學者、官吏經世思想的差異。

三、思想取向是經世思想分殊的根本基礎

㈠古文與經世

很有趣的是，在一份桐城古文派的人名錄當中可以找到一些討論貨幣危機學者的資料。管同、龔自珍、陳鱣、楊象濟、吳鼒、吳嘉賓、李兆洛都包括在內。[46] 古文與經世究竟有何關聯？桐城古文派最直接的宗旨是寫出明白曉暢之文。其所以立意如此，原有其經世的目的在。

古文之名，是相對於駢文而成立的。唐代的韓愈，反對六朝以來的駢辭儷句，主張恢復先秦兩漢的文體，稱其所作之文爲古文。宋代以後，這種文體逐漸流行，主要原因，乃在其較不受格律（句式、音韻）的拘束，較之駢文，容易發揮思想。唐宋以來，知識分子在未仕之前，必須參與考試。考試科目中，策論及公文的擬作，甚爲重要，這是對當世事務的意見。士子們平日練習，則以史論爲題。史論在性質上是對古代事務的意見。不管是策論，史論或公文的擬作，都以古文較爲方便。唐宋八大家的文集中，有大量的策論、史論、奏議以及書制等，其故便在於此。這

40 林滿紅，〈口岸貿易與近代中國——臺灣最近有關研究之回顧〉，《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頁 907。

41 G. 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4, pp. 3-43, 295-228, 363-339.

42 有關傳統中國的城鄉關係，參見：F. W. Mote, "City in Chinese History。"

43 沈垚，《落帆樓文集》，卷 24, 11b, 12b, 14b。

44 王鎏，《錢幣芻言》，頁 25b。

45 趙靖，易夢虹，《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頁 62。

46 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1:7～9:1。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期刊資料庫

些文字的性質都是「經世的」，所以所謂古文，實有很深遠的經世傳統。

古文大師姚鼐 (1732～1815) 的弟子方東樹 (1772～1851) 卽曾經指出：「不足以經世之文卽爲無用之文」。[47] 古文無論在內容或在寫作技巧方面都立意成爲經世的工具。方苞 (1668～1749) 曾於清初提倡古文。其 1733 年所編的《古文約選》原是供準備科考的人閱讀。透過這本文選，他希望將來要經世的考生一則可以了解聖人義理，二則可以增進寫作能力。[48]

除了熟悉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揣摩寫作技巧之外，古文學者必讀的文章還包括涉及古代經世問題的「禮」。方苞曾編撰《三禮義疏》——卽周禮、儀禮、禮記的註解。[49] 曾國藩爲孫鼎臣的《畚塘芻論》所寫的序中曾明顯指出「禮」與「經世」的關聯：

> 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廛市、巫卜、繕稿、天鳥、蟲蟲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嘆丘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東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幷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50]

當王鑒曾經提到閱讀清代《通典》、《通志》、《通考》的重要時，他說：「昔人之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本朝掌故，猶之律令也。」[51] 王鑒的傳記指出他是一個「志在經世」的人，[52] 讀典章制度方面的作品也就是遂行經世之志的一個必要過程。古文家對典章制度的重視也可從姚鼐的文章被稱爲「官文書」的情形看出。[53]

涉及頗多典章制度的文章有它寫作方面的問題。桐城派文人徐松的賓客沈垚卽曾指出：

> 諭帖告示文體之至俗者也，而俗體尤當出以雅馴。……晉宋後魏等書，凡議律令制度及論食貨財用等文，皆禀經酌雅、簡鍊整肅，無一苟者。竊謂諭帖告示，當用其法，而參以昌黎之變化，牧庵之駿厲，方不媿〔愧〕爲儒者之言乎。若謂如此用筆，無以喻今之人，而必如世俗之爲，則豈可？編爲一集

47 郭紹虞，頁 388。
48 Hummel, p. 236.
49 Hummel, p. 236.
50 孫鼎臣《畚塘芻論》序，頁 1。
51 王鑒，《錢幣芻言》，頁 1b。
52 張履，《積石文稿》，卷 17, 1b。
53 郭紹虞，頁 3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輕付棗木，於政事未必有益，於文章大有所損。[54]

即使文章內容有很多典章制度可供政事的參考，文字技巧如果不講求，不清楚的文意將無補於政事。古文派於是起而呼籲「文章」的重要。[55] 方苞指出他將獻身於失其傳者七百年的「小術」——寫作技巧。[56] 在陸耀所編的《切問齋文鈔》書後語中，方東樹說：「夫有物則有用，有序則有法；有用尚矣，而法不可偕」——在言之有物之外，也要注意文章的寫法。[57] 方苞的另一學生劉大櫆 (1697?～1779) 也曾指出，寫文章的目的在於揭櫫義理使有用於社會，要達到這個目的則有賴於文章家的本事。[58] 與這些學者同時的漢學家戴震則認爲：「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也。」[59] 由這個對照，也可看出桐城派學者對寫出有用之文的特別興趣。

沈垚也曾指出乾隆、嘉慶年間學者官吏多刻詩文，到了道光年間，學者官吏則愛刻議貼告示——一種官文書。[60] 這個觀察也可佐證一般所體察的經世思想在道光年間的崛起。而由姚鼐於 1779 年所編的《古文辭類纂》——桐城派重要教本，到 1820 年才被刻印，[61] 也可以看出桐城文派與經世學派在道光年間都有了明顯的發展。

(二)古文主支系的分殊

在寫出明白曉暢之文以求經世這個共同目標之下，道光年間的桐城文派有一個支系衍出。其創導者爲張惠言，因祖籍江蘇省陽湖縣，故稱此派爲陽湖派。張惠言的古文師從錢魯思與王悔生。錢魯思又學自劉大櫆，劉又學自方苞。[62] 原來的正統桐城派則爲姚鼐所繼，姚鼐雖向劉大櫆學方苞的古文，但對方苞所謂的「義法」與劉大櫆有不同的見解和强調。

就方苞而言，「義法」可以分成兩字或合成一詞而加以解釋。分成兩字時，義是道，是眞理，也是文章的內涵；法是文，也是寫作的技巧。當義法合爲一詞時，

54 沈垚，《落帆樓文集》，卷 8, 17a 言及沈垚協助徐松編地理書。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言及徐松由左楣學習桐城古文。

55 孫鼎臣，《眷塘舜論》，序，頁 1。

56 郭紹虞，頁 358。

57 郭紹虞，頁 389。

58 劉大櫆，〈論文偶記〉，轉引自：葉龍，《桐城派文學史》，頁 84。

59 郭紹虞，頁 395。

60 沈垚，《落帆樓文集》，卷 8, 17a。

61 Hummel, p. 900.

62 張惠言，《茗刻文二編》，1881，下：2a～3a，頁 4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則全指文章的寫法。[63] 在方苞看來，義或道是指程朱哲學，法則指韓愈或歐陽修所領略的文章寫法。[64] 義法兩字或合解或分解，視文章的性質而定。於論說文，則作分解，於敍述文，則作合解。[65] 這也是方苞所說的：「法隨文變」。[66]

劉大櫆在義法當中，特別著重法。在講求法的過程中，劉特別注重神氣、音韻與字句。[67] 由於古文之中，沒有標點，也沒有分段，音韻、字句的講求將有助於表達作者的思路。[68] 在學習古文的過程當中，陽湖派強調「意」的掌握。[69] 相對地，姚鼐較爲著重義，對於音韻與字句不若劉大櫆講求。[70] 而在「法」的掌握方面，桐城主系較重視篇法與章法。[71] 在學習「法」的過程中，也較著重背誦。[72] 此派文章因而被認爲多摹擬而少新創。[73]

此外，桐城主系學者較爲專注於古文與宋儒之學，陽湖派則同時致力於駢體文、考證與諸子百家之學。雖然姚鼐也致力於考據，但是當時的漢學家，甚而是他的學生，都不敢恭維他的考據功夫。[74] 戴震甚而因爲姚鼐的考據功夫不够而拒收他做學生。[75] 相對地，在張惠言與惲敬跟錢魯思學古文之前，張惠言已經精通考據與駢體文，而惲敬則曾廣泛閱讀諸子百家。從張惠言、惲敬學習古文的李兆洛更加推廣駢體文。李曾編《駢體文鈔》而與姚鼐的《古文辭類纂》互相抗衡。李反對只寫駢體文，或只寫古文。他更批評桐城主系的古文：「但言宗唐宋而不敢言宗兩漢」。[76]

桐城與陽湖兩系文人，另有一相異之處，乃在其所宗的經學有今古文的不同。由於陽湖支系對考據及諸子百家的興趣，使其與今文學發生關連。陽湖是常州府的府治所在，常州府則爲清代今文經學崛起之地。常州莊存與因爲指出《春秋公羊傳》的重要性而爲清代今文學奠下基礎。[77] 莊存與外孫兼弟子劉逢祿則是第一位指

63 同上，頁 361。
64 同上，頁 360~361。
65 同上，頁 362。
66 引自：《桐城派研究論文集》，頁 98。
67 郭紹虞，頁 366。
68 同上，頁 367, 374。
69 張惠言，《茗柯文二編》，下：2b。
70 郭紹虞，頁 370。
71 沈垚，《桐城文派論》，頁 5~9。
72 郭紹虞，頁 392。
73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頁 333。
74 郭紹虞，頁 385~386。
75 Hummel, p. 900.
76 引自郭紹虞，頁 399。
77 Hummel, p. 2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劉歆濫用《左傳》的學者。劉逢祿更將《左傳》與《穀梁傳》加以比較，而强調《公羊傳》之優於《左傳》。[78] 龔自珍向劉逢祿學《公羊傳》[79]。1838 年龔自珍寫《春秋決事比》發展劉逢祿的理論。[80] 魏源也由劉逢祿學習《公羊傳》，他的《詩古微》與《書古微》曾指出古文經學對詩經及書經詮釋上的錯誤。[81] 魏源與龔自珍也從李兆洛、張惠言學習陽湖古文。[82]

桐城主系學者，如果也治經學，多半仍治古文經學。古文經學在鄭玄以來約十五個世紀的中國經學史當中一直居於凌駕地位。[83] 周予同《經今古文學》曾列舉十九世紀所有今文學人物。其中唯有邵懿辰治桐城派古文。[84] 邵懿辰曾指出劉歆之僞造古禮。但周予同也指出邵懿辰是所有這些今文學人物當中唯一指出今古文異同，但不完全贊同今文的一位學者。屬於桐城古文主系的吳敏樹的傳稿指出，當吳敏樹遊學京師時，曾與梅曾亮、朱琦、邵懿辰、王拯、孫衣言和吳敏樹同鄉——曾國藩一起研究「古文經學」。[85]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都以研究六經爲對象，但兩派經學對孔子在六經編纂過程中的地位有不同的解釋。今文經學認爲孔子是六經作者，撰作過程中用了他自己的解釋。他是一位哲學家，也是一位對當代政治有很大制衡作用的素王。而就古文經學而言，孔子不過是將既有的歷史資料編成六經的人。他只是一個歷史學家，對當代政治不構成任何威脅。[86]古文經學强調要祭祀人鬼，今文經學則强調祭祀天神。[87] 此外，今文經學者認爲除了帝王之外，學者官吏還需對天負責。[88] 今文學强調君子的自我表現。[89] 今文經學者認爲發展與變遷是自然的歷史現象。[90] 島田虔次對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差異的總結是：古文經學傾向於强調種族民族主義、革命，與上層

78 Hummel, pp. 518-520.

79 Hummel, p. 432.

80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頁 621。

81 周予同，《經今古文學》，頁 32。

82 大谷敏夫，《包世臣の實學について》，引梁啓超語。

83 有關古文經學在中國經學史上的支配地位，見周予同，《經今古文學》，頁 27。

84 邵懿辰之治桐城支派古文，見：故宮史館檔，傳稿，第 4328 號，吳敏樹。

85 故宮史館檔，傳稿，吳敏樹。

86 周予同，《經今古文學》，頁 11。

87 同上，頁 43。

88 Jack Dull, "History and the Old Text-New Text Controversy in the Han," 轉引自 F. Wakeman, *History and Will*, p. 107.

89 F. Wakeman, *History and Will*, p. 111.

90 Hellmut Wilhelm, "Chinese Confucianism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Encounter," in Jansen ed., *Changing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Modernization*, p. 308.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建築的優先性，今文經學則傾向於强調世界主義、進化、自由主義，與經濟發展的優先性。[91]

雖然有些學者認爲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名在這個時代還未出現。但是吳敏樹傳稿及蔣湘南的評論分別用到「古文」與「今文」兩個名詞。蔣湘南指出，在時人當中，最爲尊敬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因爲他們深通「今文」家法及本朝典章制度。其《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三書》中有稱：

> 其當吾世而獲從捧手者，有劉禮部申甫、龔禮部定庵、魏刺史默深。三君精西漢今文之家法，而又通本朝之掌故。[92]

魏源所撰《書古微》自序更明顯地並稱「今文」與「古文」：

> 書古微何爲而作也？所以發明西漢尚書今古文之微言大誼，而闢東漢馬鄭古文之鑿空無師傳。[93]

蔣湘南與沈垚的論述曾明顯指出桐城與陽湖兩系的對立。蔣湘南認爲劉、龔、魏所寫的古文才是「眞古文」，而桐城主系學者所寫的古文並非眞古文，所守的義法並非眞義法。[94]蔣湘南的弟子也說蔣湘南志在矯除歸有光、方苞所引進的「僞八家」流弊。[95]沈垚在寫給住在鄉村朋友的信上，指出龔自珍的文章，雖然在京師深受推重，但都是譁衆取寵之作，不如其鄉下朋友所做的文章篤實：「都下言古文皆推龔定庵。閒亭（其朋友名）不求人知。人亦無知閒亭者。垚竊爲定庵畫鬼，閒亭畫人。人見鬼則驚，見人則了無可異。都下言古文者不數人焉。……吾鄉于譁世取寵之事不能與通都大邑爭，而學術文章竊恐通都大邑之遜于吾里也多矣。」[96]

兩系的對立由姚鼐的時代到曾國藩的時代越演越烈。姚鼐的《古文辭類纂》收了十六篇劉大櫆的文章，還多於蘇軾的十五篇。曾國藩與吳敏樹兩人都抱怨姚鼐對劉大櫆的寬鬆。[97]曾國藩雖然聲稱要揉合駢體文、考據，與桐城古文，但他也曾說：「國藩之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98]曾國藩並將姚鼐與周公、孔子並列。曾國藩所希望發揚光大的桐城文派主要是姚鼐所屬的桐城主系。[99]

---

91 島田虔次，《章炳麟について——中國傳統學術と革命》，頁 407, 408。

92 蔣湘南，《七經樓文鈔》，〈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三書〉。轉引自：李伯榮，《魏源師友記》，頁 124。

93 魏源，《古微堂內外集》，外集，卷 1, 51a～61a —再用「今文」、「古文」。

94 轉引自郭紹虞，頁 401。

95 蔣湘南，《七經樓文鈔》，卷 12b; 39a～42b。

96 沈垚，《落帆樓文集》，卷 10, 5b。

97 《桐城派論文集》，頁 85。

98 郭紹虞，頁 441。

99 郭紹虞，頁 4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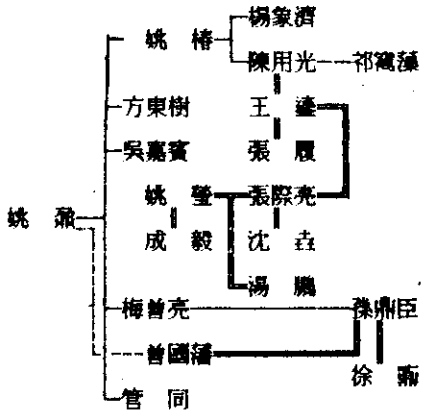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㈢經世學者的學術淵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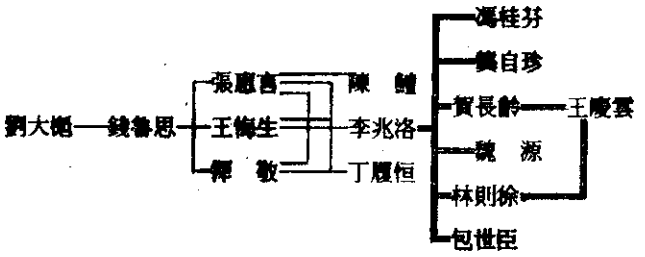
在貨幣危機中有過論述的經世學者不一定有特別的文學或經學依歸。如果有的話，可以發現這些學者的經濟主張所含蘊的社會理論與其所依歸的文學或經學派別有其精神上的一貫之處（參見表三）。

表三　桐城古文派系譜（附：今文學派系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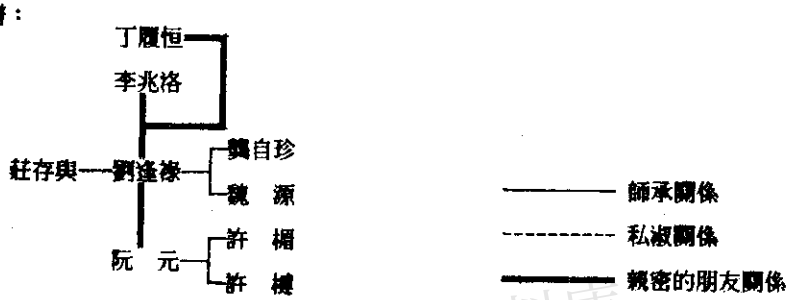
桐城派主系：



陽湖支系：



今文學派系譜：



鼓勵安貧、反對追求經濟利潤的方東樹，反對貿易與私人企業的管同，與梅曾亮合爲姚鼐的三大弟子。[100] 提倡重農抑商並主張以布帛穀物取代銀兩做爲交易手

100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頁 379, 388。

段的孫鼎臣曾從梅曾亮研習古文。[101] 孫鼎臣與曾國藩同鄉，孫的文集曾由曾國藩加以總校，[102] 而與這位桐城巨將有著密切關連。主張嚴禁貿易及認爲政府處理貨幣問題有無比力量的吳嘉賓也是梅曾亮弟子。吳嘉賓的古文還被認爲可以比美姚鼐。[103] 反對富人的豪奢並主張廢銀的徐棗，與孫鼎臣係爲同科進士，兩人也同爲梅曾亮的親密朋友。[104]

極力鼓吹膨脹性貨幣政策並認爲農業是主要財富來源的王鎏曾經從其族兄學習古文。[105] 他本人也曾選取清代許多古文作品臨摩撰寫。[106] 由他的交遊關係可以推知他所學的古文與桐城主系較爲接近。他二十年以上的密友張履是桐城主系古文的名家，[107] 另一位密友張際亮 (1797～1842) 自稱自幼卽好學桐城古文。[108] 張際亮極爲親密的老師沈維鐈乃爲王鎏多年的幕主。[109] 張際亮與姚瑩的關係更甚於他人。姚亦桐城主系文人，乃姚鼐姪孫。姚瑩因爲在鴉片戰爭期間在臺灣誤捕英人而被判刑，張爲姚奔波平反，一直到死。[110]

主張發行大錢的楊彙濟是姚椿的弟子。[111] 姚椿，祖籍江蘇，曾由姚鼐學習古文，講求水利、邊防等經世之學。晚年則積極宣揚朱熹及其弟子之學。[112] 主張嚴禁移民及商人奢侈的謝階樹，擅長於「古文辭」。[113] 其模仿古人之作有時還更優於前人。[114] 贊成發行大錢的成毅，與曾國藩同鄉，其文集之出版曾得到曾的協助。[115]

相對地，首先鼓吹鑄造金幣、銀幣的丁履恆，祖籍常州，曾由莊存與之子莊述祖學《春秋公羊傳》。他本人也寫了《春秋公羊例》。張惠言、惲敬、李兆洛等均

101 故宮史館檔，傳稿，第 4328 號，孫鼎臣，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卷 7。

102 江口久雄，〈清代經世家の銀流通史研究について——十九世紀前期を中心に〉，頁 153。

103 故宮史館檔，傳稿，第 4494 號，吳嘉賓；費行簡，《清代名人小傳》，頁 202～699。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頁 2a。

104 《碑傳集補》，卷 24, 11。

105 張履，《積石文稿》，頁 1b。

106 同上，2a。

107 故宮史館檔，傳稿，第 5418 號；張履，《積石文稿》，序。張履詩集之中曾詠王鎏擁書圖，張履也爲王鎏寫傳。

108 張際亮，《張亨甫全集》，卷 2, 1～2。

109 同上，卷 19, 28a。

110 故宮史館檔，傳稿，第 5418 號，張際亮，第 4390 號，姚瑩。

111 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頁 3。

112 故宮史館檔案第 4424 號，姚椿。

113 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 32, 18, 48, 32。〈清史列傳〉，〈文苑傳〉，卷 77，22。

114 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 32, 18, 48, 150～198。

115 成毅，《求在我齋文存》，序。

中央研究院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之密切交往。李兆洛與劉逢祿並稱常州二申。透過丁履恆的介紹，李兆洛曾由劉逢祿學《公羊傳》。經由李兆洛的介紹，丁履恆向包世臣學經世之學。[116] 包世臣曾主張海運南漕、票鹽，與以銅錢替代銀兩做爲會計單位。他與陽湖派的關係非常密切。李兆洛與之深交，包曾利用李擁有五萬册的藏書樓寫書。[117] 包女且妻予張惠言之姪。[118] 反對發行膨脹性大錢或紙鈔的馮桂芬則曾受學於李兆洛。[119] 龔自珍積極認爲私人的財產應該加以維護，人之所以爲人卽因其具有私心，在反對政治力過度介入經濟力的同時，只希望有一個小政府的存在。魏源曾鼓吹政府鑄造銀圓，或使用玉、貝，不反對發行可以兌換的紙幣，認爲透過對外貿易可以習取西方長處，富人奢侈可以增加窮人的就業機會。他主張民營礦業、票鹽制度、海運南漕。他也領悟到私利得以充分發揮反而可以運作出公利來。龔自珍與魏源曾由劉逢祿學習今文經學，也都曾學習陽湖古文。[120]龔自珍的外祖父段玉裁與丁履恆在師友之間。[121]

包世臣自己說他所有向陶澍提出的建議都爲之所接受。[122] 可見陶澍與陽湖派人物之間的關係。在高級官員當中，林則徐、賀長齡與陽湖派人物的關係也很密切。林則徐於 1823 至 1836 年擔任江蘇按察使及布政使期間與包世臣、魏源深交。林則徐曾經建議並且自行鑄造銀圓。他也主張海運南漕，鼓勵中國商人到海外貿易，並認爲礦商的自我摸索反而可以找出最好的礦藏。這也是對市場機能的一種體認。1837 至 1838 年林則徐在湖南巡撫任內也曾與桐城主系人物如張際亮、姚椿交遊[123]，但因林則徐在湖南的時間短暫，仍以與陽湖派的關係較爲接近。

魏源除了協助賀長齡編纂《皇朝經世文編》之外，也與賀長齡的家人有密切往來。賀長齡的岳父還由湖南寫信問在江蘇的魏源有關投資方面的建議。[124] 賀長齡本人曾積極支持中國境內的區間貿易，也主張應用貴重金屬鑄造硬幣，由錢莊繼續發行私票、海運南漕、民間開礦，與陽湖派的論點也都較爲接近。

對王鎏的膨脹性貨幣主張，除了魏源、包世臣之外，陳鱣、許楣、許槤都加以激烈批評。張惠言是陳鱣的老師。[125] 許楣、許槤則是阮元的門生。[126] 阮元是李道

116 江口久雄，〈清代經世家の銀流通史研究について〉，頁 33。
117 江口久雄，《包世臣の鈔法論に關する一考察》，頁 2。
118 胡薇玉，《包愼伯先生年譜》，頁 34a。
119 江口久雄，《清代經世家の銀流通史研究について——十九世紀前期を中心に》頁 45～46。
120 大谷敏夫，《包世臣の實學について》，引梁啓超語。
121 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頁 336。
122 包世臣，《安吳四種》26: 34a。
123 林崇塘，《林則徐傳》，頁 180。
124 趙靖，易夢虹，《中國近代經濟思想資料選輯》，頁 107～108。
125 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頁 3b。
126 江口久雄，《清代經世家の銀流通史研究について——十九世紀前期を中心について》頁 47。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南（1712～87）的學生，李道南則爲莊存與的座主。阮元在 1829 年編《皇清經解》時曾收入了很多今文經學的作品。[127] 而阮元所以編《十三經註釋》與《皇清經解》是劉逢祿建議的結果。[128] 許楣批評王鑒作品的專著——《鈔幣論》在往後編的幾本經世文編中一直到 1898 年常州人盛康編的《經世文編續編》中才被收入，[129] 也可略窺許楣與常州派的關連。

也有些學者官吏的主張介於以上兩羣學者之間，而其交遊關係也介於兩者之間。以湯鵬爲例，他反對商人的消費方式凌越官吏之上。但他贊成民營企業，票鹽制度。他是桐城主系梅曾亮的好友，梅爲湯撰寫墓誌銘。[130] 桐城主系的姚瑩也爲湯鵬立傳。[131] 但湯鵬也與魏源、龔自珍在北京共組宣南詩社，互相唱和。[132] 湯鵬與反對鑄造大錢而與林則徐關係密切的李星沅也有很深的關係。在李星沅的詩集中，有好幾首湯鵬爲李父、母所吟的詩詞。[133]

再以吳鼒爲例，他主張限制人民的土地所有權，也主張廢止銀的使用而改用穀物、布帛、紙幣做爲交易媒介。但他也主張以改進農業技術爲解決問題的主要手段。他是吳德旋的學生而與張惠言、惲敬有密切往來。根據張舜徽的評述，吳德旋先學陽湖，再學桐城，不過兩者都不精通。[134] 但吳德旋的傳記說他長於敍述，他的古文曾聞名文壇達二十年之久。[135] 吳德旋在古文方面之介於陽湖、桐城兩派之間與其弟子吳鼒之經濟主張介於務實派與道德派之間也有其思想上的呼應。

四 兩派學者的交誼與對立

在陽湖、桐城兩系發展的同時，彼此之間仍有其共有的志趣——古文與經世，兩派之間也因此仍時相往來。以當時在北京成立的宣南詩社而言，其成員則包括程恩澤、陶澍、林則徐、梁章鉅、黃爵滋、龔自珍、魏源、姚鼐、張際亮、湯鵬、陳

127 Benjamin Elman, "Ch'ing Dynasty 'Schools' of Scholarship", p. 14.

128 Hummel, p. 519.

129 盛康乃盛宣懷之父。

130 湯鵬，《浮邱子》，墓誌銘。

131 同上，1a～3b。

132 同上，1a～3b，林崇塘，《林則徐傳》，頁 87。

133 李星沅，《李文恭公全集》、詩集、目錄。

134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卷 12, 373。

135 故宮史館檔，第 5418 號，吳德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用光、何紹基、吳嘉賓、梅曾亮與謝階樹。[136] 兩派之間也經常有書信往來，吳嘉賓曾寫信給林則徐表示他的貿易主張，沈垚也曾寫信給龔自珍討論軍事史的問題。[137]

儘管陽湖、桐城兩派人物之間有這樣的往來，但兩者之間又見其分殊以及對立。謝階樹在任職翰林院期間，交遊很少，龔自珍是他少數幾個朋友之一，但於道光二十二年（1844），謝階樹曾出版了一本書批評龔自珍的意見。[138] 兩派的交遊與對立最明顯的例子是有關王鎏《錢幣芻言》的溝通過程。這本書曾透過王鎏的至友張履送給包世臣，顯出兩派之間的交誼。但王鎏的作品引起包世臣、陳鱣、魏源、許楣、許槤的激烈批評，則顯示出兩派之間思想的對立。

在同一派之間，雖然有細節方面的差異，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如陽湖派的賀長齡主張用白銅鑄造硬幣，林則徐、魏源主張用銀鑄造硬幣，丁履恆主張用金、銀、銅鑄造硬幣等，在細節方面是有差異的，但其主張採用有實質價值的幣材，以免政府藉發行貨幣搜刮人民財富的精神是一致的。

有些學者仍找不出其學派方面的關連。以繆梓爲例，無法看出其與陽湖或是桐城有何淵源。但繆梓的主張與包世臣非常接近，可能曾受到包世臣的影響。至於御史朱嶟、劉良駒、江西巡撫吳文鎔等以銅錢替代銀兩的主張曾受到包世臣的影響。[139] 廣西巡撫梁章鉅鑄造大錢的主張、吏部尚書花沙那的發行紙幣主張可能受到

136 大谷敏夫，〈包世臣の實學について〉，頁 39，林崇墉，《林則徐傳》，頁 88～93。謝階樹加入宣南詩社前身——消寒詩社事，見 Whitbeck, p. 247。此處轉引 Polachek 之博士論文，頁 170, 186。湯鵬，《浮邱子》，頁 1a～3b，指出當時姚鎔在北京時，與魏源、張際亮、龔自珍、黃爵滋、徐寶善、湯鵬等交遊。張際亮，《張亨甫全集》，卷 4, 23，卷 2, 35, 36，載及當丁履恆晚年到北京時，張際亮與之建立忘年之交。張曾爲丁履恆母撰墓誌銘及祝壽文。湯鵬，《浮邱子》，1a～3b 指出張際亮亦宣南詩社之一成員。陳用光（1768～1835）乃姚鼐門徒之一，曾爲姚列印信函（Hummel, p. 901）。

137 沈垚，《落帆樓文集》，記載頗多沈與王鎏之間的連繫。序言部分載及沈與王曾在同一座主之下通過生員考試。卷 7, 21a，卷 10, 4a，載及王鎏曾爲沈之老師寫傳。而沈與龔自珍論軍事史，見同上，卷 4, 19a。

138 Judith Anne Whitbeck, "The historical vision of Kung Tzu-chen (1792-1841)." p. 186；趙靖，易夢虹，《中國近代經濟思想資料選輯》頁 154，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 32, 18, 48；《清史列傳》，文苑傳，卷 73, 22。

139 包世臣，《安吳四種》，卷 26, 38a～39b，指出：「至銀價日增，中外皆以爲憂，惟世臣憂之獨早耳。拙集《齊民四術》內農政門有〈與張淵書〉、〈答王亮生書〉、〈再答王亮生書〉、〈銀荒小補說〉，皆言救銀貴之弊者。三書王亮生已列入其鈔幣集中，小補說，江西各官皆有鈔本。近日臺諫所言，大都依此以立說。」此爲 1846 年包世臣所留下的記錄。而《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一册，頁 109 指出道光皇帝命令中外大臣討論 1844 年江西巡撫吳文鎔，1845 年御史劉良駒，1846 年御史朱嶟以錢代銀的奏摺。由於此等官吏的建議與包世臣非常接近，包世臣所說的：「江西各官皆有鈔本，近日臺諫所言，大都依此立說。」顯然是指吳、劉、朱等的建議曾受包的影響。

王鎏的影響。140

除了找不出學派關連或受他人經濟思想影響的學者官吏之外，就以上所舉的諸多學者而言，其所揭櫫的經濟主張與其所選擇的文學、經學流派實有共同的核心思想。

㈤經濟主張、文派、經派間共有的核心思想

1.有關變遷的觀念：

雖然對於方苞的「義法」兩字，桐城較重義，而陽湖較重法，但方苞也指出：「法隨文變」，桐城、陽湖兩派基本上都接受變的觀念；只是桐城派所著重變的「法」是「篇法」、「章法」——一種結構上的變，而陽湖派著重音韻與字句上的變——一種技術上的變。這樣一個文派基本觀點的不同與其經學的區分也有其共同點。今文經學强調漸進與發展，發展的背後有賴技術的改進。古文經學著重根本的變革，根本變革背後則著重透過教育來改變意理思想及制度體系。古文經學之强調意理思想與桐城派在義法之中較著重「義」以及古文經學强調根本變革與桐城文派重視「篇法」、「章法」，都有其一致之處。

在經濟主張當中，也存在著這種對照。道德派王鎏以及當時的人對他所提出的全面貨幣改革稱爲「變法」。務實派魏源用「更」來說明他所提出的局部貨幣改革。馮桂芬對他的局部貨幣改革主張以「改法」來形容。龔自珍的改革主張也只以「更法」、「改圖」來描述。激進與漸進的對照不管是在經濟主張中或在用來描述這些經濟主張的語彙上都可以看得出來。

在貨幣危機期間，人民的遷徙更趨頻繁。賀長齡在討論這方面問題時，曾認爲漢人移入苗人地區，有助於漢人技術之引介苗人。在討論與銀流出入密切相關的對外貿易問題時，包世臣、林則徐、魏源也都注意到透過這種貿易關係可以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這些證據都指出務實派對於技術進步的興趣。而在英和有關採礦的建議當中，提到自然資源原爲供人所用而存在。當討論到流民問題時，包世臣反對很多人認爲這是人口過多的結果，他認爲人口就是勞力的來源，是爲財富的基礎而非負擔。這些例子也顯示出務實派對發展的興趣。

140 梁章鉅於 1826 至 1832 年間任江蘇布政使，1841 年任江蘇巡撫。《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頁 336 江蘇候補道胡調元提及：「……江蘇梁撫卻請行鈔法論，皆以銀幣必須變通，鈔法可充國用。」梁章鉅另建議鑄造大錢，其主張與王鎏相近（梁大錢議見：《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頁 143，王鎏之大錢議見其《錢幣芻言》，以王鎏人在江蘇，其所著《錢幣芻言》曾廣泛送學者官吏，梁章鉅的主張有可能受王鎏的影響。

相對地，道德派如果對開礦方面表示意見，則多持反對看法。他們未曾提到以技術改進爲社會變遷的主要工作。反之，他們對教育的興趣特別濃烈。這也牽涉到兩派對人性看法的根本不同。道德派認爲人性自私，有待教育來加以改善，務實派則視人性的自私以爲當然，甚而認爲人在追求自私的過程還有可能導致公利的意外效果。王鎏《錢幣芻言》當中，主張在錢票之上印提倡程朱之學的朱柏盧家訓曾引起包世臣、許楣的批評也可以看出道德派透過教育來影響社會變遷的較濃厚興趣。

2.有關權威的看法：

以上證據並不表示務實派對教育全無興趣。魏源曾經選其他四部書取代原有的四書充當教本。務實派一向認爲自然與市場力量可以牽制政治力，魏源之另選四書也可體現此派人物對於有限權威的看法。當丁履恆、魏源、林則徐、賀長齡鼓吹用貴重金屬鑄造硬幣以及採用可兌換的紙幣時，他們引述「聖人」、「天」、「五行」來做爲制衡君權的力量。這與今文經學認爲素王或天對世俗政權可以構成一種制衡一樣也蘊含一種有限君權的觀念。今文經學有關君子獨立人格的强調也與務實派强調個人的經濟自發性有其一貫之處。陽湖文派的鼓勵獨創字句而誡模擬也與今文經學强調個人的自由表現、務實派提倡私人企業、貿易自由、移民自由的主張有共同的基礎思想。反之，古文經學對「忠」的强調與道德派有關君權萬能及桐城文派强調模仿前代古文大家，在精神上則有其並趨之處。

四、結　論

以往的研究者常將晚清主張變革的思想溯源於道光年間崛起的經世思想。有關經世思想之崛起於道光年間，則又歸因於此時今文經學的興起。相對地，James Polachek 認爲在這時期根本無所謂今文學派。十九世紀初葉以江蘇爲主要根據地的經世學派根本不是爲追求某一學術目標的成員組合。他們不過是架構在不同等級官位的既定互惠關係之上，至少其中一部分是用來遂行這個團體的特殊利益。[141]

本篇論文的研究則指出道光年間的經世思想的確是一種追求變革的思想。不過並非所有的經世思想都與今文經學有關連。與之有關連的一派經世思想只追求局部與漸進的變革，另有一派追求整體與激進變革的經世思想則與古文經學較有關連。[1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41 B.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p. 237.

142 關於兩者的分劃，詳見：Thomas A. Metzger,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 pp. 74-80 and his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pp. 188-190.

兩派經世學者因爲有經世的共同興趣，彼此仍互相往來。兩派經世學者的成員很多都是 Polachek 所說的組合——宣南詩社的成員。但他們變革主張基本精神之分歧，很難被用來證明他們提出主張的目標是用來促進他們這個團體的特殊利益。同樣是宣南詩社的成員，謝階樹、梁章鉅、何紹基、吳嘉賓、梅曾亮與龔自珍、魏源、陶澍、林則徐有非常迥異的看法。龔自珍贊成移民、謝階樹完全反對移民。兩者都主張加强宗族的力量來吸納流民。但龔自珍主張政府對宗族的干預越少越好，而謝階樹則認爲政府對宗族的婚姻、遷徙、出外經商都要給予最嚴密的管制。梁章鉅反對奢侈，魏源則認爲富人的奢侈可以增加窮人的就業機會。梁章鉅、何紹基曾提出與王鎏相似的大錢建議，而王鎏的大錢建議是魏源所激烈反對的。魏源、陶澍、林則徐都建議要讓商人在經濟事務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吳嘉賓以及他和梅曾亮的密友徐鼒、孫鼎臣都積極鼓吹政府限制商人們的活動。除了共同的經世主張之外，經世的具體方案以及背後所含蘊的思想則不相同。

但他們經濟主張背後的核心思想則與他們所選擇或所接近的文派、經派背後的核心思想一致。這樣一個事實指出，基本信念的選擇是道光年間兩派經世思想的分殊基礎。

馬克斯學派認爲一羣人必先有社會結合，才接受代表這個團體利益的一套共有思想，而非先有共同的思想選擇才結合成一個社會團體。就本文的研究看來，十九世紀初葉中國兩派經世思想之所以分殊，現實利益如某年齡羣的利益，某政府部門的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利益、種族利益等都不能加以解釋。基本信念的選擇纔是學派形成的根本基礎。

徵引書目

一、中、日文

（按作者姓氏，史料名稱首字羅馬拼音之字母次序排列）

張際亮《張亨甫全集》孔慶儁校版，1867。
張惠言《茗柯文二編》1881。
張　履《積石文稿》1894。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趙　靖、易夢虹《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1980。
趙　靖、易夢虹《中國近代經濟思想資料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82。
陳絳民〈王茂蔭及其貨幣理論〉，《天津社會科學》，1984.2。

143 有關馬克斯的這個說法，參見：Joyce Oldham Appleby, *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　毅《求在我齋文存》，1958。
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合編《鴉片戰爭》上海神州國光社，1954。
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1924。
江口久雄〈清代經世家の銀流通史研究について——十九世紀前期を中心に〉《社會經濟史學》45.2 (1980)。
蔣湘南《七經樓文鈔》1869。
蔣　彤《李申耆年譜》1913。
周予同《經今古文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金融史料組《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一輯，上册，北京中華書局，1964。
傳包，臺北故宮博物院檔案。
傳稿，臺北故宮博物院檔案。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1885。
馮桂芬《顯志堂稿》校邠廬，1876。
《皇朝經世文續編》葛士濬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
《皇朝經世文編》賀長齡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
《清碑類鈔》徐珂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
許　楣《鈔幣論》海昌許氏，1846 年。
徐　薰《未灰齋文集》1886。
胡韞玉《包愼伯（世臣）先生年譜》。
周駿富，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7。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商務印書館，1934。
國史館《清史列傳》。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上海，1959。
李星沅《李文恭公遺集》1877。
李　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1890。
李伯榮《魏源師友記》湖南岳麓書社，1983。
梁章鉅《師田瑣記》1845。
梁　堃《桐城文派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
林崇墉《林則徐傳》臺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67。
林則徐《林文忠公政書》1885。
林滿紅〈口岸貿易與近代中國——臺灣最近有關研究之回顧〉，《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世界書局，1962。
劉聲木《桐城文學撰述考》世界書局，1962。
繆荃孫《續碑傳集》1910。
繆　梓《繆武烈公遺集》小宋山館，1881。
閔爾昌《碑傳集補》1923。
大谷敏夫《包世臣の實學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XXVIII. 2~3, 1969. 12。
包世臣《安吳四種》1846。
沈　垚《落帆樓文集》1858。
島田虔次〈章炳麟について中國傳統學術と革命〉1958。
大清歷朝實錄　臺北華文書局，1964。
孫鼎臣《魯塘舜論》1860。
上諭檔（方本）臺北故宮博物院檔案。
湯鵬《浮邱子》1865。

政治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桐城派研究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63。
王　鎏《錢幣芻言》1837。
魏秀梅《清季職官年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第五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
魏秀梅《陶澍在江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第五十一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魏　源《古微堂內外集》1870。
魏　源《聖武記》1878。
吳嘉賓《求自得之室文鈔》1866。
巫寶三，馮澤，吳朝林《中國近代經濟思想與經濟政策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1959。
葉　龍《桐城派文學史》香港龍門書店，1975。
葉世昌《鴉片戰爭前後的貨幣學說》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二、英文

Appleby, Joyce Oldham. *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Elman, Benjamin. "Ch'ing Dynasty 'Schools' of Scholarship," *Ch'ing-shih wen-t'i* 4.6: 1-44 (December 1981).

Elman, Benjami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Hummel, Arthur W.,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Taipei: Ch'eng-wen Reprint, 1972.

Jones, S.M. and P.A. Kuhn.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80-1911, Part I. Cambridge, E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King, F.H.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845-189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Lin Man-houng. "The Empty Bottle Versus the Spilling Jar: Two Statecraft Schools in the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o be published by *Late Imperial China*.

Martin, R.M. *China: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Social*, 2 vols., London, Brewester and West, printers; 1847 preface.

Metzger, T.A.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Metzger, T.A.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188-190.

Mote, F.W. "City in Chinese History," in *Traditional China*, ed, James Liu and Wei-ming Tu, 1970.

Skinner, G.M.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3-43, 195-228, 363-399.

Wakeman, F. *History and Will*.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3.

Whitbeck, Judith Anne. "The historical vision of Kung Tzu-che (1792-1841)."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lifornia; Berkeley, 1980.

Wilhelm, Hellmut. "Chinese Confucianism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Encounter," in M. Jansen, ed., *Changing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Moderniz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